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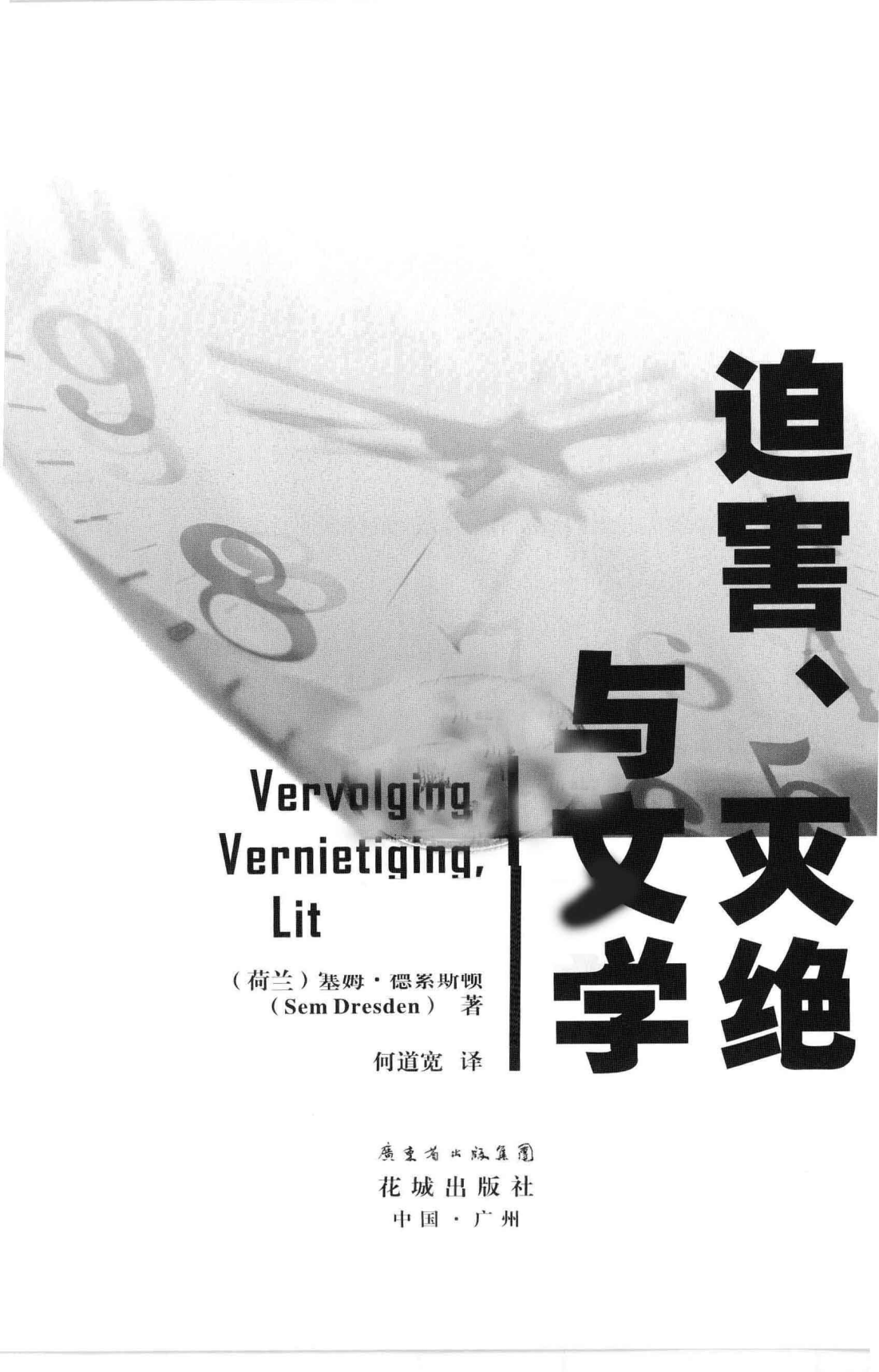
迫害、 与文学 灭绝

Vervolging,
Vernietiging,
Vervolg

(荷兰)塞姆·德累斯顿 著
(Sem Dresden)

何道宽 译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

迫害、 与文学 灭绝

Vervolging
Vernietiging,
Lit

(荷兰) 塞姆·德系斯顿
(Sem Dresden) 著

何道宽 译

广东省出版集团
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合同登记号：图字 19—2011—026 号

Copyright © 1991 S. Dresden and J. M. Meulenhoff bv, Amsterdam.
Original Dutch title: *Vervolging, vernietiging, literatuur.*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迫害、灭绝与文学 / (荷) 德累斯顿 (Dresden, S.)
著 ; 何道宽译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2. 2
(双狮译丛)

书名原文: *Vervolging, Vernietiging, Literatuur*
ISBN 978-7-5360-6314-3

I. ①迫… II. ①德… ②何… III. ①犹太文学—文
学评论 IV. ①I106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16002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责任编辑: 林宋瑜 揭莉琳
技术编辑: 易 平
装帧设计: 梁丽辉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)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20 开
印 张 12 4 插页
字 数 235,000 字
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2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购书热线: 020—37604658 37602954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从奥斯威辛到南京大屠杀

塞姆·德累斯顿（Sem Dresden, 1914—2002）的《迫害、灭绝与文学》（Persecution, Extermination, Literature）是文学评论里的一部力作，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大屠杀文学、战争文学和犹太文学进行论述。

该书以反映纳粹迫害与屠杀暴行的文学为研究对象，作者还原这一题材的历史背景，探索读者反应的种种命题，研究这一文学题材的特殊性。同时又提出了文学与现实的普遍问题、可靠性和真实性的概念问题、历史时间与小说时间的问题、生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。

“文学”、“迫害”、“灭绝”和“解放”等四章论稿勾连紧密，融为一体。评述的对象含几十位作家、几十部作品、众多的历史记述和遇难者的只言片语。哀婉而明快的笔调使历史栩栩如生，睿智而深刻的评论使作者独树一帜。该书目光犀利、内容丰富、思想深刻、给人启迪。

一、书名考

书名里的三个关键词“迫害”、“灭绝”、“文学”，是该书前三章的题名。书名省掉了第四章“解放”。为何？有何特别用意？

经过仔细打磨、反复推敲、深入研究以后，我的猜想是：没有特别意思，更没有特别用意。“迫害、灭绝与文学”和“迫害、灭绝，文学与解放”应该没有多大差异，只不过四字并列的书名略显冗长而已。

书名的翻译亦经过反复推敲。起初，我们尝试译为《纳粹迫害与

犹太文学》，既突出两个主题，又比较符合简洁明快的汉语书名习惯，还契合中国读者有关的知识结构。

经与花城出版社的林宋瑜、揭莉琳小姐磋商，最后将译名定为《迫害、灭绝与文学》。这似乎有两个好处：一是贴近原名，二是比较偏离“传统风格”的书名。

二、快速扫描

本书分四章，由四章相对独立的论文组成，外加一篇绪论：四章题名为：文学、迫害、灭绝、解放。至于第四章章名后为何加一个问号，下文将尝试予以说明。

“绪论”回答了几个重要问题：书名是否亵渎圣贤。纳粹暴行是否能用文学表现？史家和文学家如何做到“客观”？“迫害、灭绝、战争”这一类文学如何分类？文学批评的一般术语是否能用于战争文学的评判？

第一章“文学”可以视为全书的总论，涉及本书所谓“战争文学”的分类、术语、写作手法等问题。记叙文里有历史记述和报告。常规的类别有诗歌、小说、剧本。此外，作者所谓的“自我文献”（ego document）含日记和回忆录。

“战争文学”的分类中，作者启用了一些独特的术语。他区分真相（truth）、现实（reality）和事实（fact），区分文学（literature）和纪实文献（document），用上了“扣人心弦的史诗”（gripping epos）和“戏剧性的历史记述”（dramatic historiography）等描绘性标签。

在写作手法的批评中，他采用的术语有：纪实（document）、虚构（fiction）（fiction）、有色彩渲染的（colored）、介入性（involvement）、非写（non-writing）、非说（non-speaking）、静止（stillness）、缄默（silence）、晦涩（ambiguity）、间接手法（indirectness）、时间混淆（temporal confusion）。

每一章里都有大量的作家作品分析，“文学”篇不例外，在此不赘。

第二章“迫害”追溯了反犹太主义和偏见、源头和温床。自两千多年前犹太人被罗马人杀戮而流散以来，漂泊的犹太人与各地的本土居

民、犹太教徒与基督教的矛盾贯穿始终。十字军东征是对他们受冲击的第二波。近代以来的反犹主义终于导致纳粹的驱逐、迫害和灭绝政策。

这一章列举的对犹太人的偏见达数十种。作者揭示了巴尔扎克《人间喜剧》和左拉《金钱》的反犹主义的倾向，但他认为，莎士比亚的《威尼斯商人》不是反犹主义作品，也不是悲剧，而且断言“莎翁肯定没有反犹的意图。”（77页，本序引文出处均指原书页码，下同）。

这一章剖析了希特勒、纳粹机器、党卫军的疯狂、欺骗、伪装、冷血、集中营和死亡营的恐怖和绝境，又展示了犹太人区的另一种秩序、“王法”和生存，犹太人区的领袖的荒唐和无奈，抵抗战士的疯狂、不屈和尊严。

兹摘引一段显示犹太人就被妖魔化的文字：“犹太人是商人，骗钱，欺诈；他们是知识分子，傲慢，偏执，顽固，情绪化，太顾家，死抠条条框框，没有创造性，杂乱无章，讲卫生很滑稽，一心想钱，懦弱，鲁莽，钻牛角尖。他们喋喋不休，喜欢用胳膊说话。犹太人是资本家、社会主义者、布尔什维克，或者有这样的秘密身份，或者以这样的身份招摇；他们正确地或错误地自认为是上帝选民；他们寄生在其他健全民族的身上，腐蚀别人的纯洁……千百年来的基督教思想煽起了反对犹太人的情绪，这种情绪有宗教根基：谋害基督的人应该偿命。犹太人给井水投毒，传播瘟疫，喝基督的血逾越节——人们曾经深信不疑犹太人的邪恶。”（73页）

第三章“灭绝”转入死亡营，描绘了死亡、英雄主义、认命和悲剧搀合在一起的恐怖情景，描绘了勇敢的抗争与无奈的认命。杀人机器把犹太人逐出家园称为“行动”，灭绝犹太人的计划称为“终极解决”，通向毒气室的路称为“升天街”，卡车改装的毒气室称为‘流动剧场’。死亡营把囚徒变成“非人”和“物体”。纳粹把党卫军变成齿轮、螺丝钉和“物体”。

三段文字足以显示死亡营的恐怖。

集中营就是死亡营：“那一定是无底深渊，恐怖地狱。之所以是无底深渊，那是因为，它真的没有底，生存的基本条件被剥夺，死亡名单花样翻新，无休止的、令人痛苦的点名，各种可能的折磨，无耻

的医药实验，心区的苯酚注射，处决，时刻潜伏的死神，暂缓的死神步伐，永恒的安息……”（112页）

受害者被逐出家园遣送到集中营的第一幕：“下车以后，他们站在那里，只听见德国人的叫喊声、皮鞭声、狗叫声，数千人挤在一起，有些年轻人形容枯槁，吃尽了苦头，他们还要经历最可怕的折磨。而且，家人被强行分开，让人不解。至于分类筛选的工作，则由一位戴手套的军官决定，他随意挥手把人分为两组，一组向右，一组向左，谁也不知道目的何在——能说的话他已经说了。两组人都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，所以被装进卡车的人有时还引人羡慕，这是因为虽然立即被处死，他们却不用走路。其他人被驱赶着走进营区，从头到脚被剃个精光，手臂上被烙上一个号码，经过一个固定的仪式以后，他们从一堆破旧衣服里捡起几件，然后在恐怖的集中营里尽快找到自己要去的地方；手里拿着那几件破旧衣服，他们还是奉命赤身裸体站立。到达营区以后，他们再次被抢走一切随身的物品：他们赤条条，没有钱，没有食物，没有照片，没有手表；总之，什么也没留下，连喝汤的碗勺都没有。完完全全异样的感觉：即使还有什么个人身份，它也让位于无名氏的号码了。”（110页）

非人的囚室产生可怕的后果：“剃光身子、烙上编号使人感到羞辱，使个人身份消失殆尽，人人都发现自己陷入迷惘，完全不明白营里的现实，一切都不能理解，但那迷惘、那现实的确存在；人内心的自我和外部的世界都是千真万确的现实，却又不真实的现实，这是一种超现实。”（112页）

第四章“解放？”的介绍稍微详细一点。

首先需要说明，原文的“liberation”有多重含义，除了“解放”，还有“解脱”。

接着我们尝试解释，为何第四章的题名“解放？”用了一个问号。

看来这个问号有双重含义。作者认为，完全意义的解放是不可能的，战争文学只能瞄准某种程度的解放（185页）。他又认为，“情感的满足、问题的解决、人身的解放并不是文学的使命，也不应该是战争文学的使命。”（202页）

囚徒的“解放”极其有限。在极端苦难、恐怖、亦生亦死、生不如死的“濒死人”状态中，囚徒千方百计地寻求超脱、解脱、解放、

苦中作乐的极有限的娱乐、白日梦。

幸存者的“解放”并不完全。一方面，他们获得了解放：“你不能永远是受害者……新篇章必须开启……你必须与苦难的时期拉开距离。生活还要继续，苦难的经历早已过去。”（176页）另一方面，他们患上“解放次日晨的头痛症”：“幸存者背负着死者的亡灵……他们自己也感觉是陌生人，不能像人们期待那样去适应正常的生活，不能适应必需的生活。一句话：身体解放以后，心灵未必获得了解放。（159—160页）

这一章的作家作品很多，限于篇幅，我们摘引短小的6首诗歌，借以管窥“解放”的主题。

（1）利奥·弗罗曼的诗歌《和平》：“如果一只硕大的鸽子飞来/用爪子攫住橄榄枝，/用他的喙贴近我的耳朵倾诉/如同唱诗班，那甜美的女声/啾啾鸣啭，娓娓道来/战争消亡了/重复一百次/我将哭个不停……来吧，鸽子，今晚讲故事/战争如何过去/重复一百次/我将哭个不停。”（178—179页）

（2）犹太人的首摇篮曲：“睡吧，我的孩子/不在你的小篮里/睡在小灰堆里，睡吧。”（189页）

（3）J. 格拉茨坦的《青烟》：“从焚尸炉的烟尘里/一个犹太人渴望至圣的上帝/他随青烟逝去/妻儿随之飘逝。”（189页）

（4）J. 曼格尔（J. Manger）的《加利西亚》：“我们加利西亚的犹太人永远抹掉你/你不是爱以色列的上帝……犹太人的梦想和现实都被抢夺，/它们双双死去。/你的见证人都在沉睡：/婴儿，妇女，/青年，老人。/连那36贤人，/你的圣人，你的世界的栋梁，/都已坠亡，陷入永恒的昏睡……幸存的人！享受你们的幸福，/我们每个人的泪水，在虎穴里闪烁。/要记住，我们的惨死。/绝不要忘记，为生活殉难。”（189页）

（5）丹·帕吉斯（Dan Pagis）的《卡车》：“在这辆卡车里/我爱娃与儿子艾贝尔在一起/如果你看见我的大儿子/该隐，亚当的儿子/告诉他我在哪里。”（190页）

（6）奈莉·萨克斯（Nelly Sachs）的《烟囱》：“你呀烟囱！/通向耶利米和约伯骨灰的自由道路……/谁在心中设计你，谁用石头垒成你，烟囱？/难民的道路用烟火修筑？/唉，死者的居所，/诱人入

住/因为主人曾经就是客人——/你呀手指，/放在入口处的门槛上，/就像插在生死之间的尖刀——/你呀烟囱，/你呀手指，/以色列的身体在烟火中飘逝！”（191页）

德累斯顿把犹太人的幽默作为寻求解放的压轴戏。他说：幽默有解放和抚慰，使人超然，亦使人导致认命；幽默不同于喜剧，亦不同于悲剧；幽默使人在短暂的生命中得到解脱。（204页）

他还在幽默中寻求微言大义，全书以一首儿歌结尾：“从明天起，我很惨，从明天起！今天我要高兴。悲痛有用吗？你告诉我！明天太阳又照耀我们，我们不再遭罪。从明天起，我可能会悲伤，但今天我不会！”（205页）

三、为“战争文学”辩护

德累斯顿这本书所谓的“战争文学”特指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文学，尤其指反映纳粹迫害、屠杀和灭绝犹太人的文学。他重视叙事文学、纪实文学、历史记述、回忆录，并将战争文学与美文（belles-lettres）相对。他说：“质言之，战争文学与美文没有共同之处。”（17页）

同时他又认为，战争与文学从古至今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：“从一开始，文学史就充满战争的兽行和令人扼腕的事件，罄竹难书，简短的罗列也难以穷尽……古典作品的主人公历尽磨难、千锤百炼、百折不挠，他们勇于经受了一切考验，建功立业，永享荣光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战争与文学显然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。”（4页）

德累斯顿认为：“文学是为历史作证的最佳途径，我们绝不能忘记这些历史事件。”（Ⅶ页）

然而，许多幸存者选择沉默，许多批评家也主张沉默，认为那场浩劫太悲惨、太野蛮、难以启齿、不可言说。他们认为，“一旦诉诸文学，那就是美化。对如此野蛮、难以理解的暴行，唯有缄默、不用文字才是恰当的态度……小说、诗歌以及任何其他样式的文学都不能使人感觉到事情的真相，也不能表现战争的恐怖。”（Ⅷ页）

一些大牌学者就反对反映大屠杀的文学。

哲学家和美学家阿多诺说：“奥斯威辛之后再写诗，那就是野蛮

之举……”对此，德累斯顿回应道：“我不得不承认，阿多诺这些言论并不能使人深受启发……但无论野蛮与否，文学还是继续前进；虽然对文学的执著已经过去，或表现为不同的方式，但文学的作用注定还是要继续维持下去。”（186页）

比较文学家和文化批评家乔治·史丹纳呼吁，“文学界在奥斯威辛和毁灭的课题上保持沉默……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犹太人蒙难以后，描绘浩劫的文学再也没有生存的权利了……唯有不加虚饰的白描才能加以考虑，因为文学加入了大量不妥当的虚饰。”德累斯顿反驳说：这“是史丹纳个人的偏见”。（186—187页）

哲学人类学家金特·安德斯与阿多诺和史丹纳的意见对立，从另一个极端为战争文学的存在进行辩护，似有些过头，他说：“唯有通过文学，事实才能澄清；唯有通过具体的情景，大量难以述说的事情才能得以澄清并令人难忘。”（187页）德累斯顿对此给予中肯的批评：“已如上述，‘高雅的品味’在战争文学里不起作用。更尖锐地说，侈谈品味、非难《大屠杀》这部电影的人可以说是“不道德”的。”（187页）

思想家和政治理论家汉娜·阿伦特剖析纳粹屠夫阿道夫·埃希曼的专著《埃希曼在耶路撒冷》（Eichman in Jerusalem）非常深刻，但在解释其罪行时却有一些疏漏。她用所谓“平庸的罪恶”（banality of evil）来解释埃希曼罪行就不太令人信服。（153页）

对此，德累斯顿提出尖锐的挑战：“试问，那是他完全的平庸产生了可怕的罪恶呢，还是说平庸本身就是可怕的呢？”（153页）

他接着说：“阿伦特这样的说法表达了问题，却没有解决问题。”（153页）

《迫害、灭绝与文学》独树一帜、内容丰富、思想深刻。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，该书对“战争文学”做了全面的梳理和论辩，对数十计的作家和作品做了公允的剖析和评价。这是犹太文学和文学批评中难得的精品。

四、从奥斯威辛到南京大屠杀

几乎在翻译《迫害、灭绝与文学》的同时，我为北京大学出版社

翻译了世界名著《菊与刀》，很自然要将日本人、德国人和犹太人进行比较。

我的第一个结论是：任何民族，无论其国民性如何，一旦踏上军国主义和法西斯的道路，必然从人变成兽，由人变成魔。

二战期间的奥斯威辛死亡营和南京大屠杀是世界历史上的两大毒瘤。德国人勇敢割掉毒瘤，脱胎换骨。日本人不知悔改，不但不深刻反省，反而肆无忌惮地否认血淋淋的兽行。

二战期间的德国和日本结成轴心国，实为必然，盖因主政者臭味相投，自视优越，侵略扩张，一个欲荡平欧洲，一个要征服亚洲。

他们因疯狂而征服，因征服而疯狂，很快走上不归路。

两者的不同是，德意志民族真诚反省，日本人未曾悔罪。

19世纪下半叶，日本完成明治维新，主张脱亚入欧，大举军事扩张，二三十年内就从一个极其落后的边陲小国一跃而为世界强权，头脑膨胀，自认为天下无敌。

两个国家和民族何以如此相似，又为何如此不同？

这是中国人、日本人和世界人民都不得不直面的事实，不得不长期研究的课题。

美国人类学家露丝·本尼迪克特的《菊与刀：日本文化模式论》为我们提供一把钥匙，使我们得以解读日本文化之谜。

日本人从人到兽、从人到魔、从文质彬彬到杀人如麻的急剧震荡行为，我们可以从中求解。

战败以后，日本的变化翻天覆地，短短二三十年内，一跃而成世界顶尖的经济体。但一切变化仅为表层皮毛而已。日本的文化心理底层并未剧变，军国主义的抬头，政治的向右转，靖国神社的幽灵令人不安。日本的变化乃“革面”之变，并未完成“洗心”的脱胎换骨。

日本人的反省需要外人的帮助，对外人对日本文化的批评需要武器，本尼迪克特教授的旷世奇书具有永恒的认识价值和批判威力。

作者历数日本文化的重重矛盾，国民性的两面性，用“既……又……”的套语加以归纳：日本人既彬彬有礼，又趾高气扬、盛气凌人；既顽固僵化，又欣然适应极端的革新；既恭顺服从，又很难服从自上而下的控制；既忠心耿耿、宽宏大量，又背信弃义、心怀恶意；既无所畏惧，又畏首畏尾；既服从铁的纪律，又桀骜不驯、长有反

骨；既专心致志、热衷西学，又很保守。

道德的两难困境盖源于几个因素：

(1) 道德标准中有“目”无“纲”，不能“纲举目张”；

(2) 道德准则仍然是原子似的积木块，忠、孝、情义、仁、情感等是积木，却没有统御一切的“拱顶石”；没有总览一切道德的“全图”，只有相对分散的“忠的圈子”、“孝的圈子”、“情义的圈子”、“仁的圈子”、“情感的圈子”；

(3) 而且，“日本人的道德准则或道德“圈子”总是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，情况一变，截然不同的行为变化就必然发生。”所以他们自认为，战争期间的人变兽、人变魔就很自然。

五、马萨达，钓鱼城，汶川地震

世所公认，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是两个凝聚力最强大的民族。

经历无数的灾难、饥荒、内忧、外患、动荡、分裂之后，中华文明岿然不动，成为唯一健在的古老文明而独傲天下。其他的古老文明或已荡然无存、香火不再，或已枯萎凋谢、今非昔比。

犹太民族颠沛流离，亡国而不灭种，人离散而心不散。

公元一世纪，犹太人反抗罗马占领者，试图复国，惨败。马萨达是起义者的最后堡垒，破城前军民自杀，精神不死。

1200 余年后的中国钓鱼城保卫战，逾 36 年，苦撑中华大地危局，同样悲壮，更可歌可泣。如今，重庆合川的钓鱼城仍然回荡着那悲壮的旋律。

1279 年，蒙古占领军被迫接受不杀一人的条件，拔掉这颗孤悬一隅的钉子，建立元朝，统一中国。钓鱼城军民全身而退。在蒙古大军横扫欧亚大陆几十年，破城必屠城，钓鱼城未遭屠城，这是唯一的例外。

成吉思汗的儿子蒙哥汗战死钓鱼城后，征欧大军的首领急忙东归，争夺汗位。如此，“上帝之鞭”放弃西征，止戈于奥地利。如今，中国钓鱼城被欧洲人誉为“东方麦加”、“上帝折鞭处”。一个小小的钓鱼城改变了世界的历史。

2011 年 5 月 12 日是汶川大地震三周年纪念。灾区重建的奇迹震

撼世界，震撼我的心灵，使我再次重温中华文化顽强的生命力。

犹太民族几千年的颠沛流离，越挫越勇，为人类贡献了伟大的聪明才智。

这两个民族强大的凝聚力是难解之谜。我曾经做了一些尝试。请允许我从几年前出版的《中华文明撷要》（汉英双语版，何道宽著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，2004年）里摘录一段文字，借以解谜：

“华人和犹太人是两个凝聚力最强的民族。无论他们如何漂洋过海、流离失所，他们都会抱成一团。他们的民族观念、民族认同非常强烈。

“犹太人的凝聚力可以有两种解释。一是发自内心的渴求。他们坚信自己是上帝选民，他们和上帝有圣约，是上帝的宠儿。这一信仰赋予他们无与伦比的自豪。抱着只信上帝的坚定信念，他们始终心怀强烈的使命感，要不辜负上帝的旨意和期望。

“第二是来自外部的压力。数千年来，自从被逐出家园之后，他们遭受了无穷无尽的灾难，经历了千辛万苦，惨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屠杀。他们别无选择，惟有万众一心才能挫败外部的压力。有趣的是，外部的压力正好能加强内部的团结。

“然而，就有一些骄傲和团结的犹太移民，居然在中国文化的汪洋大海中冰消雪融了。公元12世纪，一批犹太人经过长期的颠沛流离来到中原的开封定居。他们办教堂，做礼拜，可是无法长期坚持。后来终于失去了宗教信仰，失去了民族的身份。他们已经融入中国文化的熔炉之中了。

“从古到今，中国文化的熔炉产生了难以抗拒的魔力。千百年来，游牧民族在干旱气候的驱使下一次又一次地挥师南下，侵扰中原乃至全国，或掠夺财富，或武力征服，或入主中华。然而，无一例外的是，征服者总是被征服，被中华高度发达的文化征服。被征服的方式有两种。一是自觉自愿地选择汉化。一是在外在环境的压力下无可奈何地接受吸收和融化。”

何道宽

深圳大学 2011 年 5 月 12 日

每当读到一本异乎寻常的书时，人们常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冲动，想将其送到尽可能多的人手中。1992年秋，我拜读塞姆·德累斯顿（Sem Dresden）的这本书时，就体验到这种激情。一个念头油然而生：将其翻译成英语，以便使其不再局限于荷兰文读者的圈子。

作者探讨了一个困难而棘手的问题：应该如何解读反映纳粹政权迫害和灭绝犹太人暴行的文学。彼时，很大一部分欧洲已经沦陷。这个题材很特殊，读者的受到道德谴责和情感内疚等因素的影响，在其他课题的文学里，这些因素不起作用。尽管如此，德累斯顿还是提出了有关文学与现实的普遍问题、可靠性（authenticity）和真实性（truth）的概念问题、历史时间与小说时间的问题、生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。他对死于纳粹迫害的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，他研究文学基本角色的笔调明快，两者的奇异结合使他笔下的历史栩栩如生。几篇论稿勾连紧密，融为一体。怀着言不尽意的相对性，他提出建议，提出问题，尝试解答。但掩卷之余，读者清楚看到作者的立场：他从事这一研究课题，很动感情，但不伤感。对他而言，文学是为历史作证的最佳途径，我们绝不能忘记这些历史事件。

我们的英译本在原作初版4年后问世。在一些细节里，我们可以看到这4年的变化。《辛德勒的诺亚方舟》（Schindler's Ark）改编成了《辛德勒的名单》（Schindler's List）。史蒂芬·斯皮尔伯格（Steven Spielberg）执导的电影问世以来，有关那段历史的资料比德累斯顿撰写这本书时的素材多了。1994年10月10日的《纽约客》（New Yorker）发表了詹姆斯·帕克·斯隆（Sloan）的《考辛斯基的战争》（Kosinski War），文章披露了令人震惊的史实：1991年的小说《彩绘鸟》（The Painted Bird）作者的身份是杜撰的。倘若德累斯顿知道这一真相，他对《考辛斯基的战争》的评论将是另一番样子，甚至会被删节。不过，《迫害、灭绝与文学》的主要锋芒并不会因这些变化而被错钝。

在我这个译本里，所有书名都用两种文字，德累斯顿读到的书名

之后用括号置入我的英译名，且用斜体。大多数情况下，读者若想寻找我没有提及的英文版，可以用我的译名作为搜寻的出发点。如此，德累斯顿读到的德文版 Nocturne c-moll (《C 楼小夜曲》)，并不与瓦迪斯瓦夫·席皮尔曼 (Wladislaw Szpilman) 原著的波兰文版 Smierc Miasta (《城市之死》) 对应。德文版只突出书中一景，表现一个德国人的正面作用，而波兰原文的书名向读者传达该书的主题。

多伦多大学英文系的修·麦卡伦 (Hugh MacCllum) 读了我翻译的手稿，大学学院的让·史密斯 (Jean Smith) 将我的手稿录入磁盘。如果没有他们的大力帮助，这个英译本是不可能完成的。他们都喜欢塞姆·德累斯顿的文字，并与他感同身受。专此深表谢忱，言不尽意。

亨利·朔格特

迫害、灭绝与文学
Persecution,

迫害、灭绝与文学
Persecution, Literature
Extermination, Literature
迫害、灭绝与文学

迫害、灭绝与文学
Persecution,

迫害、灭绝
Persecution, Literature

迫害、灭绝与文学
Extermination, Literature

目 录

中译者序 1

英译者序 1

绪 论 1

第一章 文学 21

第二章 迫害 65

第三章 灭绝 114

第四章 解放? 168

索 引 217

绪 论

对许多人而言，书名《迫害、灭绝与文学》似乎很不妥当，有点亵渎圣贤。他们可能会非常认真地反对表现战争惨剧的文字，其反对理由甚至是难以撼动的，因为迫害与毁灭总是与战争联系在一起。他们反对将战争的悲痛与文学在书名中并举。他们认为，人的苦难和暴行难以启齿，一旦诉诸文学，那就是美化。对如此野蛮、难以理解的暴行，唯有缄默、不用文字才是恰当的态度。如果需要，不加修饰的文件和文章才有助于获得比较深刻而清晰的洞见，因此他们认为，小说、诗歌以及任何其他样式的文学都不能使人感觉到事情的真相，也不能表现战争的恐怖。

即使人们接受诸如此类的观点，并绝对深信不疑，我们还是有必要承认一个意料之外的事实。从一开始，文学史就充满战争的兽行和令人扼腕的事件，罄竹难书，简短的罗列也难以穷尽。所以，我只需提及荷马的《伊利亚特》(Iliad)、中世纪的叙事诗和莎士比亚的宫廷戏，不必赘述。但一种反对的意见会在这里蹦出来，有人会说，此一时彼一时。在这些作品和相似的作品里，战争及与之相关的一切所含的意义，在过去和今天完全是两码事，其功能完全不同。那些作品的主要功能是突显主人公的英雄业绩，它们甚至表现这样的一面：真正的勇武如何在战争的暴力中绽放出最艳丽的花朵。古典作品的主人公历尽磨难、千锤百炼、百折不挠，他们勇于经受了一切考验，建功立业，永享荣光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战争与文学显然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。

然而今天，人们已经不太看重战争文学的价值，许多形式的英雄主义已成明日黄花，所以文学与战争关系的一般问题是依然存在的。但从古代的战事转到近代的例子，英雄主义仍然有迹可寻，只不过有所变化而已。司汤达表现滑铁卢战役小说描绘了一位反英雄的虚张声势，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既突出表现了光辉的英雄主义，又表现了战争的灾难。两位作家都一反古典的调子。以前的文学描绘的是有控制的秩序和作战指挥，它们却代之以令人恐怖的混乱，主人公找